

公元四五〇年六月的一天，魏都平城(今山西大同)郊外刑场阴霾笼罩，人影憧憧。北魏德高望重的三朝元老、司徒崔浩的囚车四周，密密匝匝地围满了彪悍的士兵，他们根据太武帝拓跋焘的授意，轮流向囚车里的崔大人撒尿，然后将其斩首……这是读史至《魏书·崔浩传》结局时，我眼前浮现的历史真实场景。

说起北魏太武帝，也算得上史上一位聪明大度、颇有作为的君主。而且此前跟这位才高权重的崔司徒感情一直不错，称之为当朝“第一名士”，并要求尚书以下大小官员“凡军国大计，汝曹所不能决者，皆当咨告，然后施行”。那么作为国之重臣的崔浩究竟得罪了谁？最终为何被杀呢？而且死前还要遭受匪夷所思的凌辱？

祸根就在于“国史案”。

北魏早在道武帝拓跋珪时就开始修本朝史，称为《国纪》，但记事过于简略，体例也不成系统。至太武帝时命崔浩续修。崔浩做事认真，不仅细细润色原稿，还在调查考证的基础上补充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实，以优美的文笔补入书中。完稿后又刻石立于路旁，供国人阅览。这一来，崔浩大祸临头了。

对于这部史书，崔浩最引以为自豪的不是优美的文笔，而是

同样是阅读，在不同的人身上会结不同的果。有的人，阅读是为了积聚思想展翅高飞的能量；有的人，阅读是为了谋取“体面”的职位；有的人，阅读就像训练职业微笑，充满了不走心的“虚假”；也有的人，阅读只是为了寻找谈资用于交际或炫耀；更有这样的人，由于阅读，原本属于自己的一丁点儿“想法”也因之被扑灭，就像把一桶油一下子浇在如豆一般的火苗上。

阅读量并不是越大越好，“开卷”不一定“有益”，有可能反而有害。阅读有“因人而异”的问题，得先从学会选择开始。

无论古今中外，大作家们普遍偏爱阅读古人的作品，因为公众们正在讨论和接受的观点，在他们早已是思想的一部分，或者自己正是这些观点的发明者和传播者。

古人的著作确实有着不同寻常的迷人魅力，这是“思想”和“时间”这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虚假和劣质，总是经不起时

清末，张謇考中状元，并非一蹴而就，更不一帆风顺。张孝若（张謇独子）在《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》中将先父的科举之路，比喻为高登宝塔，先慢后快。不过登上顶天宝塔，必然始于底层：张謇科考起点源自如皋，证据确凿。《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》录入“张謇考试详表”：清同治七年，戊辰十六岁，二月如皋县试，主试官：如皋知县周际霖，取第二百余名。

张謇属牛，来如参考，可谓小试“牛刀”，名次不佳，倒也未曾名落孙山，考取秀才。尽管事后颇有不快，但是日后张謇的科举履历，必填如皋。他与周际霖及其后人还结下深厚情缘。据《周氏族谱》《如皋市志》等书文记载，周际霖，贵州贵阳人，生于1814年，逝于光绪年间，具体卒年不详。他与张謇一样：得益于科举，热心于教育。周际霖生于书香门第，二叔周士堂为乾隆五十七年副

与美国不同，东晋自古以来人口众多，人地关系比较紧张，历来有农民小块土地精耕细作的传统。据《走向现代的小农》一书，近代以来，韩国与台湾地区人均耕地只有0.1公顷，户均耕地1公顷左右，人地比例属世界最高之列。1909年，美国学者富兰克林·H·金实地考察中国、日本、朝鲜三国的农耕体系，写下《四千年农夫》的不朽游记。在书中，作者真实地记载了东亚小农模式：“东亚民族的农业在几世纪之前就已经能够支撑起高密度的人口……几乎每一寸土地都用来种植作物，以提供食品、燃料与织物。”

二战结束后，韩国与台湾地区都面临着现代化的历史任务。为了维护社会稳定，并在此基础上推进工业化，韩国与台湾地区不约而同地推出了两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改革：一是实施农地改革，废除了殖民地时代遗留下来的半封建的土地制度，确立了平均地权基础上的以自耕农为主体的现代小农制度；二是推进农会改革，建立起统一的、以小农为主体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，使之成为农民增强政策影响力、提高经济竞争力的组织形式。

经过几十年的发展，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，韩国与台湾地区大力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，实现

秉笔直书 国史悲情

——读《魏书·崔浩传》札记

□汪 微

“秉笔直书”。可是最要命的是，书中对北魏皇族先祖的发迹过程，包括一些不太体面的丑事，比如苻秦灭、什翼犍逃奔阴山被其子夏侯所杀等等，全都和盘托出。这些事都是当朝皇家讳莫如深的家族隐私，于是“北人无不忿恚，相与谮浩于帝，以为暴扬国恶”。结果崔浩自然是摊上事了，“帝大怒，使有司按浩及秘书郎史等罪状”。“北人”指的是鲜卑贵族，他们为何忿恚？显然是为崔浩的秉笔直书国史揭了先祖的短，“暴扬国恶”，那还了得！

平心而论，崔浩著国史本身没有错，内容也只是“直书”，并未夸大其词，更没有失实之处。他平生所仰慕的是春秋时期的晋国太史董狐不畏强权，如实地记载“赵盾弑其君”，留下“董狐直笔”的美谈，被孔子赞为“古之良史”。崔浩也不会不知道春秋时期的那位齐国太史，因直书“崔杼弑其君”，坚持不肯修改，结果连同自己的两个弟弟都命丧权臣崔杼之手。崔浩一身凛然正气，深知据事直书是著史的起码原则，但问题是

崔浩过于天真，太不懂政治了，他的死远不是如此简单。

根据《魏书·崔浩传》的记载，崔浩“少好文学，博览经史。玄象阴阳，百家之言，无不关综。研精义理，时人莫及”。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即位后，出身汉族士族的崔浩成为最重要的谋臣之一，辅佐太武帝顺利完成了灭夏、破柔然、平北京等一系列统一北方的准备工作，深得信任。但过多地沾沐皇恩，不免滋长了崔浩在同僚面前的傲气，对那些野蛮落后的鲜卑贵族的蔑视时有流露，就连北魏名将长孙嵩也被他断言“拙于用兵”。时间一长，崔浩在朝堂上不仅是人缘不佳，甚至处处树敌。更糟糕的是，崔浩又自恃太高，与太子拓跋晃争强好胜，这更加深了太武帝对汉人的疑忌。

作为汉族士族阶层的杰出代表人物，又是在鲜卑族太武帝拓跋焘眼中红得发紫的股肱之臣，其实崔浩的处境早已是危机四伏。拓跋贵族一直视之为眼中钉、肉中刺，只是苦于找不到机会将其拔去，国史案发正好为他们

提供了绝好的借口。太武帝面对众口铄金的强大舆论压力，加上自己也深感崔浩作为汉族名门士族威望太大，对鲜卑族的统治构成威胁，于是作出了对崔浩诛灭九族的决定。太武帝的这种心态，跟战国时期秦惠文王诛灭功高盖主的商鞅如出一辙。

鲜卑上层贵族与汉族士族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，不仅来源于观念上的差异，更是由于其根本利益的冲突。譬如租佃制与奴隶制的矛盾、门阀制度与血缘贵族政治的分歧等等。汉族士族要求正式承认门阀士族的各种政治、经济特权，而鲜卑贵族害怕他们分享更多的权力对自己不利，当然不能容忍。在这些涉及鲜卑贵族核心利益的大是大非问题上，即使是崔浩卓越理政才能赞赏有加的太武帝，也一直是心存芥蒂。可是崔浩本人却浑然不知，仍一味呕心沥血地操劳国事。崔浩不存私心，自认无愧于天地，做了许多积极推进北魏汉化进程的务实工作，从长远来看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。事实上，数十年

后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巨大成功充分证明了崔浩的远见卓识。但遗憾的是，在崔浩自身所处的时代，改革时机尚未成熟。那么他所做的一切，在同僚眼中就无异于洪水猛兽了。

其实仅仅是“国史案”一事，不足以给崔浩带来杀身之祸，这不过是一场文化屠戮的导火索。纵观崔浩一生，他耿介正直的人品和致力于普及汉文化的作为本来无可厚非，缺少的只是身处险恶朝堂而知变通的圆滑之术。在一次又一次与鲜卑贵族构成正面利益冲突之后，崔浩自身的生存也成了问题，更遑论在异族统治下恢复汉文化，并实现士族门阀政治的理想。智慧有余而生存策略不足，这是造成崔浩悲剧的根本原因。他过于相信太武帝宠幸的真诚，也低估了满朝宵小的围啄威力，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政治改革意图。在这样的节骨眼上，再加上一场“国史案”授人以柄，终酿成不可弥补的千古遗恨！

崔浩的悲惨结局令人扼腕叹息，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。崔浩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正直的高官，他修国史秉笔直书的勇气无疑是令人敬佩的，但遗憾的是缺乏在长期顺境下审时度势的判断力，可谓政治上不够成熟，那么最终酿成千古悲剧也就在情理之中了。

新书架



《美好时代的背后》

[美]凯瑟琳·布 新星出版社

在孟买国际机场旁写着“永远美丽”的广告牌背后，贫民窟的居民不时梦想着更美好的生活。然而，他们掌管不了任何东西，一个微小变动便足以让他们的生活天崩地裂。这是印度的故事，却是全世界的问题。作者潜入印度底层三年，参考上千份官方档案，揭示全球资本主义神话下贫穷的真相与本质。



《秦制两千年》

谌旭彬 浙江人民出版社

自秦朝至清末，从政治层面讲，中国历史基本上就是一段秦制不断强化的历史。本书选取了16个历史横断面，着重探讨在每一个封建王朝的盛世背后，百姓生活的历史真相。作者直指封建王朝的核心理念“外儒内法”，将秦制帝国纷繁复杂的历史常态化、规律化，探索帝国运转的内在逻辑，揭示其延绵长达两千余年的奥秘。



《浪漫地理学》

[美]段义孚 译林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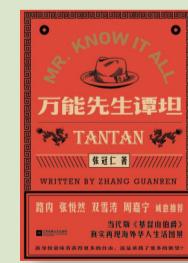
过去，每人都要懂得去哪里寻找食物、水源和栖息地；如今，所有人都必须细心经营地球家园，使之更宜安居。当今的地理学著作缺乏戏剧性、地图、数据、描述和分析比比皆是，却没有豪侠之举，没有孜孜以求的精神。然而，在不远的历史上，地理学的确曾有魔力，并被认为是浪漫的，那是一个英勇探索的时代。



《季风吹拂的土地》

[英]迈克尔·提裘提斯 上海人民出版社

这是一部关于东南亚现代化进程及其面临问题的反思和剖析的作品。基于研究者、观察者、参与者的三种身份，作者从东南亚的社会症结与历史重负出发，辅以个人经验，追溯经济与文化、殖民背景与历史遗产，内部分歧与外部渗透，深度解析地区性冲突的背后的因果，及其对于国际局势的影响。



《万能先生谭坦》

张冠仁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2000年之后，越来越多的中国学子奔向异国，他们与第一代华人留学生在伦敦交汇，显现出不同的性格气质与人生境遇。这两位人Mr.Tan勾连起来，这个神秘的谭先生被称为万能先生，他从最基本的留学生咨询业务到房地产开发、商业移民、生育保险等所有相关的华人在英国的业务都有涉及，但没几个人见过他的真面目。

关于阅读

教益。“好书不厌百回读。”

一本好书应该具有如下特点，或至少具备其中一点：

1.让人热爱生活，增添克服困难的勇气；

2.简洁明了，深入浅出，有新的发现或独特独到的见解；

3.作者好比一个优秀导游，不但带领读者饱览了沿途美景，还能提供新的线索，激起旅人继续远游寻找境的欲望。

香港有一位著名学者说，他每年都会收到大量赠书，书房里书满为患，每到年末，他总要清理出一批平庸低质的赠书扔出家门，他说这些书不配待在他的书房。

有一次参观美国国会图书馆，见大门外有新书源源不断运来，经询问得知：这些新书大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赠书，图书馆有专门的专家负责挑选，只有好书

才可以入选该馆。

若干年来，我也收到过不少赠书，我也曾对它们进行过甄别整理，但我从不把“有的书”请出家门，只是放置的位置会做些适当调整。就在昨晚，无意间翻阅了三册已经几年未碰的赠书，竟然得到了一些新的收获。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；“存在即合理”，真是一点也不错。

时间在流逝，环境在变，人不可能不变，看待同一本书的眼光也许会发生变化。同一个人看待同一本书尚且如此，更何况不同的人面对不同的书呢？

坐在窗前，濠河上吹来的凉风里似乎有那么一点点荷花的香气，蝉儿在柳条间不知疲倦地吟唱，这里刚歇下，那边又响起。回首自己50多年人生，仿佛是由无数个难忘的阅读时光串联而成。

□杨 谒

张謇善待教育先贤周际霖及后人

□彭伟 周婷

举，父亲周奎为乾隆四十五年举人，三兄周际云为道光九年进士、四兄周际钊为嘉庆十四年进士、七兄周际华为嘉庆六年进士。周际霖本人为附贡生。哲嗣周莲（1842—1920）为贡生，经恭亲王奕诉举荐，出任厦门道台，官至福建布政使。周际霖前后四次出任如皋知县，捐钱捐物，在如皋、贵阳等地，兴办养蒙、正蒙、悦来、怀少、正治、引蒙、成童等众多义塾。他资助众多寒门子弟，重获新生。

对于昔日的主考官、教育先贤周际霖及其族人，张謇后来颇为友善。

1917年3月，张謇接受周莲的邀请，为《周氏族谱》撰写佳作《判官周午亭先生家传》（《张謇

全集》未录）。张謇的文中，充满“正能量”——记事彰人：周午亭即周许方，十六岁已通经史，后改经商，帮助叔父周子荣打理播州生意，办事一丝不苟。李珍亭先生很赏识他，携其从事盐业经营。咸丰年间，播州动乱，乡绅推举周午亭暂治乡里。他办公公正不阿，政绩当前，成为通判。同治年间，曾国藩剿灭太平军后，重振盐业，任命周子愉（午亭堂叔）为观察。周午亭协助堂叔经营盐业，不幸亏损，从此寓居芜湖寺中，诵读韩愈、贾岛的诗文，直至光绪丁丑年逝世。

另据部分张謇研究专家及周家后人叙述，张謇曾请朝鲜挚友金洽江（1850—1927）为周际霖作

传《如皋县知县周君家传》（录入《金洽江全集》第2册，未录入《周氏族谱》）。金洽江于光绪三十一年浮海来华，周际霖时已下世，两人未见一面。据文中记载，民国四年，时年七十四岁的周莲老人，登门拜访金洽江，谈论作传事宜。众人皆知，金洽江客居南通，举目无亲，幸遇张謇，经其介绍，结交多位通如两地的名达贤士。周莲如何结交金氏，是否与张謇关系密切，还须考证。不过无须考证的是，金洽江在文中记下了周氏父子对于如皋的历史贡献。

周际霖任职如皋知县时，恰逢兵燹，太平军攻克东南诸省，定都南京。苏州、扬州相继失守，一南一西，都是太平军，如皋很是危急。

对于昔日的主考官、教育先贤周际霖及其族人，张謇后来颇为友善。1917年3月，张謇接受周莲的邀请，为《周氏族谱》撰写佳作《判官周午亭先生家传》（《张謇

全集》未录）。张謇的文中，充满“正能量”——记事彰人：周午亭即周许方，十六岁已通经史，后改经商，帮助叔父周子荣打理播州生意，办事一丝不苟。李珍亭先生很赏识他，携其从事盐业经营。咸丰年间，播州动乱，乡绅推举周午亭暂治乡里。他办公公正不阿，政绩当前，成为通判。同治年间，曾国藩剿灭太平军后，重振盐业，任命周子愉（午亭堂叔）为观察。周午亭协助堂叔经营盐业，不幸亏损，从此寓居芜湖寺中，诵读韩愈、贾岛的诗文，直至光绪丁丑年逝世。

另据部分张謇研究专家及周家后人叙述，张謇曾请朝鲜挚友金洽江（1850—1927）为周际霖作

传《如皋县知县周君家传》（录入《金洽江全集》第2册，未录入《周氏族谱》）。金洽江于光绪三十一年浮海来华，周际霖时已下世，两人未见一面。据文中记载，民国四年，时年七十四岁的周莲老人，登门拜访金洽江，谈论作传事宜。众人皆知，金洽江客居南通，举目无亲，幸遇张謇，经其介绍，结交多位通如两地的名达贤士。周莲如何结交金氏，是否与张謇关系密切，还须考证。不过无须考证的是，金洽江在文中记下了周氏父子对于如皋的历史贡献。

周际霖任职如皋知县时，恰逢兵燹，太平军攻克东南诸省，定都南京。苏州、扬州相继失守，一南一西，都是太平军，如皋很是危急。

小农的出路

——读董正华《走向现代的小农：历史的视角与东亚的经验》

□葛志华

地区大多采用以农育工、以乡补城的方针，通过税赋、剪刀差、“肥料换名”等多种形式，从农业汲取剩余推进工业化。台湾学者称之为“发展的榨取”。随着工业化的升级，农业的弱质性不断显现，在劳动生产率、资本回收率等方面的优势越来越明显，资本、土地、劳动力三要素净流出，“三农”问题越发严重。随着工业化的深入，非农部门不断扩大，农业从业者日渐减少，兼业农民不断增多，“农业危机”时隐时现，主要症状有食品自给率下降、城乡收入失衡、农业粗放经营日趋严重等。因此，适宜调整城乡关系，由“挤压”转向“扶持”，就成为农业持续发展的必需，也是维持农村稳定和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。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，韩国与台湾地区制订了《农业发展条例》，推出了“加速农业建设九项措施”来调整农工关系，政策导向由“挤压农业”向“扶持农业”转变。主要内容有降低农业赋税与提高农产品价格，增加对农业的投资与信贷、拓宽农会功能，扩大农户经

营面积，加速推进农业机械化。资料显示：1972年—1976年，韩国农业投资额较1967年—1971年增长了四倍，台湾也适时废除“肥料换谷”制度。此后，政府又根据形势需要，不断增加农业投资与各项补贴，实施以工补农政策